

目 录

永恒的怀念

——代序……………谢汝珍 (1)

塞上忆往…………… (3)

一、归绥中学和《西北实业报》…………… (3)

二、演话剧和砸“盛记”…………… (4)

三、白话文引起的风波…………… (6)

四、学生“开除”校长…………… (8)

五、蒋听松与《西北民报》…………… (9)

六、新文化在青年中传播…………… (11)

鲁迅著作初期在我区西部的传播…………… (14)

创造社一段史话

——60年前的两封公开信…………… (16)

五四初期新文化运动在绥远地区的传播…………… (21)

回忆包头《西北民报》…………… (27)

绥远文化、新闻界见闻…………… (30)

傅作义将军主绥期间绥远地区新闻报纸出版简况…………… (50)

绥远新闻社…………… (56)

绥远新闻事业之沿革与现况 (1934年著)…………… (63)

国民党绥远地方派系琐记…………… (69)

怀念傅作义、邓宝珊两将军

——为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36周年而作……………（83）

邓宝珊与傅作义的结识和共事始末……………（86）

抗战期间马占山与邓宝珊、傅作义的交往……………（120）

伊盟事变侧闻点滴……………（123）

毛主席给我的两封信……………（127）

日记残页抄……………（130）

一、1936年1月1日——4月3日日记

——战前绥远动荡概貌……………（130）

二、1936年4月4日——4月21日日记

——战前伊金霍洛之行……………（144）

三、1936年7月日记

——战前五当召之行……………（153）

四、1936年8月日记

——战前西安之行……………（163）

残信录……………（170）

1938年由榆林寄河曲家信1封……………（170）

附：1、河曲——榆林行日记……………（171）

2、榆林——柳林行日记……………（172）

1938年河曲之行家信10封

——邓宝珊将军随行记（上）……………（174）

附：此行日记……………（182）

1943年延安、重庆之行家信10封

——邓宝珊将军随行记（下）……………（185）

1945年榆林回绥远家信7封……………（191）

1947年二次张家口之行家信3封·····	(196)
回忆抗战前夕访问成吉思汗陵寝所在地伊金霍洛见闻···	(198)
记邵力子与景梅九两先生·····	(207)
范长江同志在绥远·····	(214)
刘半农的绥远行和一个秘密·····	(216)
我与斯诺、斯文赫定、拉铁摩尔的一点接触·····	(218)
忆荣祥先生·····	(221)
忆塞外武术大师——吴桐·····	(224)
我所知道的霍亮生先生·····	(227)
京宁湘汉行	
——内蒙政协组织的一次参观·····	(230)
诗二首 咏平庄、咏黄河三镇·····	(239)
《托克托县志》序言·····	(240)
我的自传 ·····	(241)
附：杨令德简历·····	(308)
附 录	
喜见晚晴	
——赠杨令德兄·····	杨植霖 (311)
悼词·····	巴图巴根 (312)
后记·····	编者 (315)

永恒的怀念

——代序

谢汝珍

令德兄，难道你真的永远离开我了吗？我总觉得你仍然在我身旁似的。

你在医院住了两年多，你常开玩笑说，虽然我们已经生活了53年，由于过去忙于奔波，很少能象这两年形影不离，我们真正的生活是在医院里。是啊，这两年多，我一直陪伴在你的病榻前。病情时好时坏，而你的情绪总是那样乐观，你与病魔顽强搏斗的意志感染了我，使我存在着你有一天会完全康复的希望。但是，在我内心深处，也时时耽心你病情会进一步发展。10月21日上午11时30分，这个可怕的时刻还是到来了。你安详地闭着眼睛，停止了呼吸，永远长眠了。金婚又三载，一朝连理断，我悲痛的心情是难以描绘的。

令德兄，在医院期间，有一天我外出，正值黄昏前，一轮红日缓缓西落，它把霞光留在天上，红红的，一片晚晴。我顿时想起了你。你不就是这样吗？病重入院，明知生命的最后时刻快来临了，但你竟然全不在意，只要有可能，就去参加必要的会议，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你还让我领你去逛古旧书店购买书籍。读书是你一生最大的嗜好。在病榻上你还标点唐宋诗词、古文小品等书，而且经常背诵你小时候背过的诗词文章，你说这是身不由己，脑子空闲不下来。你从这里得到欢乐和安慰。但是，你最大的欣慰莫过于为后人多留下一些宝贵的资料。你一生坎坷，经历

丰富，在卧病期间，只要病情允许，你便要写作。往往是一边输液，你一边口述，我在一边作记录。最后你再修改定稿。这些文章在报纸发表后，你总是精心剪下来，有的还要复印，作为纪念。尤其令人不能忘怀的是，进入9月后，病情本来已很严重了，你仍然奋笔疾书，写了一篇纪念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36周年的文章《怀念傅作义、邓宝珊两将军》。你这篇最后遗作，9月19日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我把报纸拿给你看时，你感到十分欣慰。这篇文章里，你用感人肺腑的言词寄语台湾相识，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感情表露于字里行间。你为不能亲眼目睹台湾回归祖国而遗憾，但深信这一天定会到来。你日记里有这样两句话：

“台湾回归祖国日，老夫九泉笑瞑目”，我会时刻记在心里。

令德兄，我们的子女都在各个岗位上勤奋地工作和学习。他们一定会继承你的遗志，报效祖国，为四化建设，为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而尽一份力量。令德啊！您安息吧！祖国和平统一之日，家祭定要告老翁。

（1985年10月）

塞上忆往

一、归绥中学和《西北实业报》

1919年“五四”运动的新思想、新文化潮流，直到1921年才冲击到内蒙古西部地区（绥远）来。当时，这个地区唯一的最高学府，是由清末的书院改为学堂的归绥中学。那时已有6个班毕业，尚有4个班，这年春又办了个第十班，招收新生。新任校长是萨拉齐人祁志厚，他是归绥中学早期毕业生，新由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归来，一接任，校长就给学校带来了一些新气象。祁志厚从北京请来李广和先生为十一班的语文教员，虽然仅任教半年就被当局以“过激派”的罪名驱逐出境，但李广和先生的半年讲学在归绥地区是产生过影响的，“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潮流在这里开始激荡起来。

我于1921年春考入归绥中学新开办的十一班，同班同学有李裕智（若愚）、吉雅泰（岱峰）、霍世休、武绍文、刘桂、董怡等人。1919年“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等事件，以及后来掀起的全国反帝反封建运动，当时在报纸上已见到了。我从粗通文字开始，就读小说、看报纸，在偏僻的托克托县，京津《益世报》尚可见到，绥远唯一的一份报纸《西北实业报》更是必读。十四、五岁时，就一面模仿报纸的形式自办小报玩，一面向《西北实业报》投稿。我用的笔名是“园叟”，发表的稿件有《捉鬼记》等，是文言笔记体。《西北实业报》的主笔是福建人杨既庵，笔名“椒山后人”，系当时绥远道尹周登皞的幕僚。也许是“园叟”二字迷惑了他，有一天他寄来一封亲笔信，对我有所称许。毕生尽瘁于小学教育的，我们的好校长刘昆山先生，曾因此鼓励我以后也努力当个主笔。

绥远出版新闻报纸，是民元后由包头人王定圻创办的《一报》

开始的。王为同盟会员，辛亥革命进攻归绥时，于枪林弹雨中伤一指。他曾为国会议员，也当过归绥中学校长。在袁世凯强逼议员投票选大总统时，王把袁世凯的“袁”字故意写成“哀”字，作为废票。后来，他在归绥从事反袁运动，被北洋军阀逮捕枪杀。王定圻以后，历届绥远当局继续出版这份日报，不过屡改名称而已。《西北实业报》历史较久，这个报在“椒山后人”主编时，有周颂尧等人参加新闻报道，以剪用京津大报的稿件为主，经常刊登一些旧诗词，如咏青冢之类，只供少数文人唱和消遣，没有起多大作用。到了1921年，《西北实业报》已甚为衰落，很长时间只有编辑一人，除有《余兴》一栏和鸡零狗碎的本市新闻外，其余新闻、通讯均从京津大报剪裁转载。“五四”运动已经快三年了，绥远唯一的这份日报还是这样死气沉沉，也足见当时文化的不景气。

报纸的内容是这样的贫乏，供给人们以精神食粮的书肆又怎样呢？1921年上半年的归绥市，仅在大召东夹道有一个小书铺，当时最新的书是《玉梨魂》、《芸兰日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小说。其实，这些书在内地已是流传较久的了。

我在托克托县上高小时，看的是《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精忠说岳传》和侠义、公案等杂七杂八的旧小说。初进中学就又被上述这些早已过时的“新书”吸引住了。这时，在学校还没有感觉到“五四”运动新文化潮流的到来，只是学校图书室从外地来的报纸、杂志较多了些，也就使人觉得大开眼界了。

二、演话剧和砸“盛记”

1921年暑假前，我得了伤寒病回家，下半年休学。正是这半年，李广和先生在归绥中学十一班，把“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潮流引进了内蒙古西部地区。他介绍白话文，传播新思潮，同学生交友谈心，亲如兄弟。李裕智、吉雅泰年龄较长，同他接触

多、受影响也深。

第二年，我继续在十一班读书。这时，我们班已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了，全校也有了改变。同学们开始用白话文写文章、写信，组织读书会，读到不少新书报。其中有上海群益书社重印的合订本《新青年》，有《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的副刊《学灯》、《觉悟》和《晨报副刊》等，还有亚东版新式标点的《红楼梦》《水浒》和高语罕的《白话书信》等。大家都贪婪地读着这些感到很新鲜的书刊。甫由北京大学毕业的萨拉齐人白映星一度来十一班讲课，他介绍了杜威和胡适，同时也讲述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新情况，但影响不大。倒是正在北京大学求学的陈志仁和绥远旅京同学会的不少同学，于暑期归来，首次在归绥公演话剧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绥远旅京学生回归绥公演话剧，先在归绥中学排练，归绥中学的师生配合参加演出，教员演主角的有郭景林先生等人，同学当配角的有数人，我是其中之一。演出的剧目是《一念差》、《孔雀东南飞》等，地点在旧城大西街同和园。同和园是一个多年的旧剧院，忽然演新剧，真是闻所未闻，所以场场客满。观众也有摇头叹息的，说：“怎么念书娃娃当起戏子来了！”

归绥公演话剧后，归绥中学各县的学生便于暑假中借上北京来的道具到外县演出，把这些话剧又搬到了包头、托克托等地。那时，当然还是男扮女装。后来，中学男女同校了，女子师范学校也成立了，各校同学自己也演起话剧来，便习以为常。

上述为当时文化运动简略概况。社会上的政治运动怎样呢？二者是密切相关的。政治运动更为活跃。

“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潮流，波及绥远地区虽说较晚，但在“五四”前后，这里的爱国主义教育，却是贯彻始终的。我们从小学时起就把纪念“五七”、“五九”国耻，反对二十一条，反对日本侵略、火烧圆明园、甲午之战，还有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课文等等记得很牢。二十年代初的绥远地区，“五四”运动的影响终于到来了。于是就爆发了走上街头的学生运动。打“盛记”的事就是

在这个期间发生的。当时归绥中学的同学上街宣传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怎么发动起来的呢？李裕智、吉雅泰和我同住一室，一天晚上他俩和我谈及要发动同学宣传抵制日货的事，我们联络同班的武绍文等同学，分头串连。武善鼓动，往往痛哭流涕，极为感人。不久全校学生就纷纷上街宣讲起来。“盛记商行”是较大的一个商店，五金杂货，钟表时装，食品等等，应有尽有。我们宣传队伍，在“盛记”门前演出，他们有人出来干涉，以致引起冲突。次日一早全校同学结队出发，大队人马堵截南北通衢，挡住军警，一队进入“盛记”铺面内，大打出手。同学们中有人在乱砸中负了伤，如孟纯（锡嘏）正在低头狠踏砸碎的怀表等物，十一班的大汉赵炽昌抱着一个大挂钟正好从孟脑后摔下来，孟当即血流如注。这一下，大家都喊“盛记”打伤了人，这还了得，于是就把个盛极一时的“盛记”砸了个稀巴烂。我们还要追究凶手。当时马福祥任绥远都统，连夜派人邀约学生代表在“盛记”商谈善后，我也列为代表之一。我们明知孟纯是被自家人误伤的，而“盛记”也被彻底砸烂了，还闹什么。于是由“盛记”掌柜的赔礼道歉了事。

三、白话文引起的风波

1922年下半年绥远师范学校成立，从此这个地区有了两个中等学校。师范系官费，是贫寒学生吃“官馒头”的地方，吉雅泰、董怡和我从归绥中学十一班跑出来投考师范学校。考题是《战国四君论》和关于乌、伊两盟十三旗的问答。第一题好办，因为在高小时就背诵过《古文释义》中不少篇章，而且对《东周列国志》比较熟，凑一篇论文并不难。倒是关于乌伊两盟的问答题，竟交了白卷，因为在高小的地理课本上没有学过，只知道有个土默特特别旗的总管衙门和河西有个准格尔旗，来归绥后在什么地方还见过挂着一个“乌、伊两盟联合办事处”的牌子，但也没有注意。

不管怎样，据说还是取中了，可是后来说对于中学退学投考师范的一概不收，我们只好向学务局交涉。我给学务局长王济若上了“万言书”，吉雅泰他们也找同情我们的中学老师曹诚斋先生等人从旁协助，最后又经过一次考试，总算录取了。这时师范学校设在旧城文庙街，早已开学上课了。

到校不到三天，就出了乱子。其时荣详（耀宸）先生在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他是仅有的绥远地区旧学根底深厚的人，精于旧诗词，擅长骈体文，在北京求学期间，又拜桐城派姚姬传一门徒为师，专攻古文，因此有“塞北文豪”之称。“塞北文豪”当时是反对新文化的，我们这些直接或间接受到“过激”分子李广和先生影响的青年，则刚刚读了一些《新青年》、《独秀文存》等宣传新文化的书籍和文章，热情正高，几乎要走“全盘西化”的路子。两个“极端”碰在一起，当然要出乱子。荣先生把我们看成轻薄小儿、洪水猛兽，我们也就把他当作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上午听了荣先生的一堂国文课，他大骂白话文，说《胡适文存》这类书，他一周就可写出一部，我们听了大为诧异。下午是习字，每人写一仿。我从小就没有多写过仿，胡乱涂抹了这么几句：“字之写不好也，笔无罪，墨无罪，砚无罪，纸亦无罪，罪在朕躬。”自称“朕”、称“寡人”，这是李裕智和我们几人当时常用的戏谑之语。一张仿纸写完了这些大字之后，尚有小小余幅，于是我又写了这样的小字：“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算甚么东西。”就在这一堂习字课上，从十一班来的老同学董怡与我不谋而合，比我还露骨，竟明目张胆地写道：“塞北有个大文豪，自大加一点，臭也！”荣先生看了我们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大发雷霆，以去就力争，非要把我们开除不可。于是我和董怡在师范入学不到一周，就在我的表弟霍世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送行下，把铺盖从师范学校搬出来了。这是1922年秋天的事。

我们被“塞北文豪”开除的事，在归绥和在北京的绥远学生

界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十一班的同学刘桂投稿北京《晨报》，揭露了这件事，对荣先生冷嘲热讽了一番，这还影响不大。在北京上大学的绥远学生陈志仁、潘秀仁、贾武等许多人，集中火力在《绥远旅京同学会刊》上攻击荣先生，我也接连向《会刊》投稿。《会刊》攻击“塞北文豪”，说理者少，讽刺者多，无非是说荣先生报考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时，不懂“牛顿三定律”，而答以“牛反刍三倒嚼”云云，其实这在当时也算不了什么。谈到被开除事，当时真是满腔义愤，认为新旧不两立，甚至说：“这样的学校，用八抬明轿来请，也不去了！”少年气盛，亦颇狂妄。

四、学生“开除”校长

1923年上半年我又进入旧绥中学，退到十二班。这时学生运动，已由归绥发展到外县，暑假前我同几个同学跑到包头、萨县宣传，也还是在街头演说，抵制日货，同时也联络些当地的高小学生，到处有聚拢来的听众，还是一种自发行动。过了几天回到归绥，才知道学校闹起了风潮。这时祁志厚已赴美国留学去了，继任校长为阎肃（静亭），学监仍是祁任校长时的成章（焕文）先生。不知什么原因，学生要求放假一天，学校当局不答应，学生便罢课了。我们从包、萨回来，已罢课数日，不管三七二十一，也加入了罢课行列。最后竟把阎校长和成学监的铺盖扔出校门外，因为我在《西北实业报》投过稿，在全体同学开会把阎、成的铺盖扔出去后，众推选我到报馆为此登一启事。我到《西北实业报》找到当时唯一的老编辑郑先生，请他出刊，以归绥中学全体学生名义，誓死不承认阎、成为校长、学监云云的启事。这一下是学生把校长给“开除”了。启事文稿是我临时拟定的，报馆不收费（我投稿也没得过稿费）。

学校乱成一堆了。过了几天，竟发生一部分学生于夜间向教

员室内乱投石子事件。眼看这个学校就要砸散了，我们托县同学，对此不满，便又由我到报馆刊登联名退出学校的声明。大意是：我们反对部分同学的破坏行为，我们从此退出学校，回家度假云云。联名的是耿正模、董怡、秦璧昌、武绍文、霍世休、刘桂、李激、杨沛、焦保国和我共十人。

从祁志厚任校长三年以来的归绥中学，因为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以后，有了些新气象，也推动了学生运动，掀起过高潮。经过1923年上半年这么一闹，学生运动从此也进入了低潮。这年下半年先由郭象伋（并卿）出面整顿归绥中学，其后很长一个时期，由赵允义任校长，潘秀仁任教导主任，把持了这个学校。归绥中学恢复后，我们这十个联名登报退学的人请求入学，学校当局很干脆，本来就想开除这些捣乱分子，如今他们自动退学，实在是大好事，请他们另作高就吧。从此，我在这里已再没有什么学校可去了。

1924年上半年，耿正模、秦璧昌、霍世休到张家口住了教会学校培植中学，武绍文、李激投考曹州中学，以后成了梁漱溟的大弟子，刘桂住了北京师大附中，我于1924年下半年也到张家口住了培植中学。我们响应上海反基督教大同盟的号召，在这个学校里公开进行反基督教活动，有时在学校的小礼拜堂内，也大声疾呼起来。第二年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这个学校就在反帝运动高潮中为我们所摧毁，从此它的中学部永远停办了。

五、蒋听松与《西北民报》

1923年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1925年冯玉祥驻节包头，西北军占据了察绥地区。由于国共合作，察绥地区革命形势也很好，土默特旗蒙古族的先进分子、早期的共产党员李裕智、吉雅泰，这时在包头组织领导了国民党内蒙古省党部（那时共产党

员可以跨党参加国民党)。我是于1924年下半年在奉军统治下的张家口秘密参加了国民党的，并在这时当选为国民党内蒙古省党部的监察委员。

革命形势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1925年下半年，由共产党人蒋听松任社长、胡英初任总编辑，在包头办起了《西北民报》。这是一张崭新的介绍新文化、新思潮的报纸，篇幅虽然不大（普通大报的一半），但比起死气沉沉的大报《西北实业报》来，却是光芒万丈，异彩夺目。《西北民报》最初石印，很快就改为铅印。我那时在家乡教书，已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等处发表过一些东西，《西北民报》出版，我就投寄稿件，还在最初石印时期，连续登了我的两篇文章，蒋听松就写信要我到报馆去工作。我一向有志于从事新闻工作，见信真是喜出望外。这年冬，我就在《西北民报》当了小编辑、小记者，一面作外勤采访，一面编一小栏副刊。从此，我就当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新闻记者。

蒋听松，浙江人，当时不过30岁，他写白话文又快又好，《西北民报》的社论大半由他执笔（冯玉祥五原誓师发出的宣言也是蒋的手笔）。胡英初，江西婺源人，年龄略小于蒋，写一手好毛笔字，文亦出色。当时的《西北民报》人员不多，最老的有一位叫周之楚的，大约近50岁；年纪最小的是刘贯一，还不到20岁。《西北民报》出版不到两年，但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不但是新文化的先驱，而且也是用语体文办的第一张报纸。就在这个报纸上，我办了本地区第一个文艺刊物《火坑》。起先是作为《西北民报》的副刊，篇幅不大，随报发行。1926年“三·一八”以后，便在北京印刷，单独出刊。因为用了《火坑》的刊名，便有“火坑社”的名称。其实，这是我和几个爱好文艺的青年朋友张罗的，也没有什么组织、章程，大家写稿，我拿印费，编好后由在清华大学求学的霍世休在北京校印出版。那时，包头、北京间还不通邮汇，我把5元一张的交通银行票子夹到一本《辞源》

的书脊里，挂号寄给霍世休，然后另写信告诉他这个“秘密”，那时5元钱也就够一期刊物的印费而有余了。“火坑社”的朋友有：我在张家口的同学广东人陈永森，他在北京的报纸上投稿，我以LT的笔名和他合作，后来他在北京住了法学院，由他介绍，又结识了他的朋友、同学万斯年、万鸿年、富良沅、狄景曹、李兆锐等人；1925年我在《西北民报》时，湖南人李记今（他是胡愈之、夏丐尊的学生）寄旧诗求见蒋听松，蒋不喜旧诗，由我接见，从此我和李记今结交了，在包头我们又结识了凌莲舫，李记今后来在河南又结识了张了且、张逢沛等；在绥远，有马映光和我通信为友，霍世休是少年时就在一起搞手写报玩的；还有个通信朋友是河北定县人，我们戏称为“盲诗人”的刘洪河。就是上面这些青年人，先后成为《火坑》的撰稿人，也就是“火坑社”的同仁。那时不相识的青年朋友常常通信订交，我从事新闻事业发轫于《西北民报》，也是由于素不相识的蒋听松一封信就这样订交共事的。

1926年冬，冯玉祥由苏联经外蒙回到后套，在五原誓师后西退。这时察绥地区已为晋军、奉军占据，《西北民报》停刊，报社同仁随军西退。1926年底，我由五原返回家乡托县，次年东北人惠慕侠聘我为他主编的《绥远日报》编辑。苟延残喘多年的《西北实业报》从此停刊，改组为《绥远日报》。就在《西北实业报》原址、原设备的基础上，全地区的报纸又成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延续了几年。

六、新文化在青年中传播

1928年《绥远日报》改组为《绥远党报》。我在国民党“四·一二”后清党时已被开除，这时祁志厚甫由美国归来，即当了绥远地区国民党首领，他又给我恢复了党籍，并任聘我为这个报的总编辑。《火坑》也在这时恢复。祁志厚在绥远不到两年就垮台了，我也随祁于1930年到了太原，在《陆海空军日报》当了半年编

辑、总编辑。

1931年，傅作义继李培基任绥远省主席。从此进入三十年代。直到“七七”事变前夕，呼和浩特先后有大报二：《绥远日报》、《民国日报》（后改为《西北日报》）；小报三：《社会日报》、《朝报》、《绥闻晚报》。包头也出了一张小报：《包头日报》。通讯社也多起来了，有“绥远通讯社”、“绥远新闻社”、“塞北通讯社”、“绥蒙通讯社”，“边疆通讯社”，五花八门，背景复杂，这且不说。下面只略述文艺刊物和报纸副刊的一些片断。

1931年我认识了张季鸾，当了天津《大公报》驻绥记者。同时也先后在《民国日报》、《西北日报》当副刊编辑，兼《社会日报》总编辑。当时人们把副刊叫作“报屁股”，并不重视，副刊编辑也不是报馆主要人物。我当副刊编辑时间很长，副刊是偏重文艺的，我在《民国日报》辟了题为《十字街头》的专栏，每天刊登一些杂文和诗歌小品，成为不少爱好文艺的青年们发表作品的园地（在我主编地方新闻版时，一度由高沐鸿编《十字街头》）。后来我把《十字街头》改为《塞风》，扩大了篇幅，虽系《民国日报》副刊，实际上是《火坑》的替身，一直出到“七七”事变前夕。抗战期间，在榆林还单独出版了不定期刊《塞风》和“塞风社”丛书《活跃的北战场》、《抗战与蒙古》数种。

《火坑》是在三十年代初停刊的。在《火坑》停刊前后，苏谦益、武达平、杜如薪、刘洪河、马映光出版了不定期刊《血腥》。如果说以《火坑》为刊名是代表一些青年虽已不满但还在忍受旧社会的苦闷，而《血腥》就是比较觉醒地对旧社会进行抗争甚至搏斗了。最后，1936年上半年，以“绥远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名义出版了一个大型刊物《燕然》。“抗敌后援会”是在吕骥、任白戈等影响下成立的（“七七”事变前夕，吕、任等曾来过呼和浩特）。《燕然》这个刊物仅昙花一现，却是从“五四”至“七七”这一时期，这个地区新文化运动的殿军。“抗敌后援会”联合了当时在呼和浩特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和进步青年，参加

《燕然》工作的有霍世休、郭根、胡彦球、章叶频等多人。

三十年代中期，我和几个朋友办的“绥远新闻社”设了书报部，尽量设法从上海等处订购新书报杂志，供应当地读者。除商务、中华、开明书店外，也同生活书店建立了关系，但这时反动派封锁甚严，我们能得到的东西不多，只不过打开一丝窗口而已。

从绥远《民国日报》改组为《西北日报》后，我仍是副刊《塞风》的编辑。1936年冬，王毅然同志在《西北日报》出了一个名为《边防文垒》的刊物，有一期转载了斯诺的《西行漫记》片断，其中有毛主席谈话的内容，经过我“小心谨慎”地删削后刊出，当时在绥远也没有引起人们（国民党官员）的注意。不想过了几天，就出了乱子。一个叫金肇圻的托县人，当时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工作，他看到《西北日报》载有毛主席的谈话，就认为是他“立功”的机会到了。于是，国民党中央给绥远省党部来电，免除了我《西北日报》副刊编辑的职务。

我当时还兼任一家小报《社会日报》的总编辑。《社会日报》的副刊，是委托章叶频、袁尘影几个青年办的，他们出了个《塞原》。在我脱离《西北日报》时，他们是我编副刊的有力助手，我没有时间去管《社会日报》的副刊，就放手由他们处理。他们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其中杨植霖、武达平、韩燕如、袁烙等是主要撰稿人。还有区外的王亚平，也经常供稿。《社会日报》的副刊一直办到绥远沦陷前夕。

（1981年3月3日）

鲁迅著作初期在我区西部的传播

“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新思潮，过了三、四年到1921年下半年才传到内蒙古西部地区（原绥远归绥，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来。在此以前，这里处于文化落后、闭塞状况，在当时全地区仅有的最高学府是一个中等学校——归绥中学校，还是传播封建文化，学生学的是文言文。市上仅有的一个小书铺，出售的最新读物为《廿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一类清末谴责小说和早期的鸳鸯蝴蝶派作品骈赋体的《玉梨魂》、《芸兰日记》等，但也为数不多。这同内地京沪比起来，要落后一二十年。所以，“五四”运动新文化的潮流便被阻隔了好几年。

1921年下半年，归绥中学请来一位国文教员李广和先生，他虽然只教了半年课，就被反动当局以“过激派”的罪名驱逐出境，但他一开始就讲白话文，介绍当时出版流行的“五四”前后的新书刊，这使学生从古典文学的圈子里走出来，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在李广和先生的领导下，后来的学生们办起了读书会，共同筹金订购新书刊。这时上海群益书社再版的《新青年》合订本出来了，在《新青年》上读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其后不断在《晨报》副刊读到鲁迅的一系列文章。从这位先驱者的初期著作里，关于“人肉筵席”、“吃人的旧礼教”这些思想概念传播开来，就引起人们打破旧枷锁的激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阿Q正传》也在《晨报》副刊陆续读到了。此后一个时期，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学灯》、《觉悟》这些副刊每月都出有合订本，都为爱好文艺的青年所嗜读。此后鲁迅的专集《呐喊》、《彷徨》等也出书了，在这一地区的青年中影响更大了。孔乙己、闰土、范爱农、祥林嫂和阿Q这些人物的形象，深深印在人们的脑海里。